



专刊

总第 101 期

2022 年第 3 期

2023 年 5 月 5 日

信息资料 欢迎交换

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新书发布 暨治理思想研讨会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中国现代治理能力建设。4月15日，由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新书发布暨治理思想研讨会”在银湖 CDI 大厦举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作者、南方科技大学产业教授殷雄亲临现场，同与会者共同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和对当代的价值。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中广核集团专职董事余志平、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原副主席黄发玉、中国企业大学联席会主席贾晶、深圳市蓝色湾区经济发展研究院副理事长高闻、中国建材深圳北新公司原总经理丁成军、国银金融租赁股份前董事长王学东等专家学者，智库百人会副总召集人段建仁、严铁鹰、陈燕燕，相关智者、媒体代表等一同出席本次活动。

现将研讨会主要嘉宾发言内容进行整理汇编，以飨读者。本刊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马洪基金会立场。

□ 致辞嘉宾

马洪基金会理事、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 谭建生——

一部“有料、有用、有趣”的治理思想力作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中国、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滋养，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发展脉络。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社会留下了浩瀚的文化遗产，孕育了独特的中华文化，并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每个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互、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中华文化作为我们血脉相通的基因在不同时期给予了不同的精神内容，也在不同历史阶段融合了各种时代的特征，从根源上塑造了我们每个人。

中华文明具有开放包容、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特质。积极对待外来文化、包容文化差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构建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发展历程和中华民族强大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所在，也是我们开拓未来力量的源泉。

传统文化几千年的发展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表达，是我们社会生活的表达与展现，时代的改变时刻让我们保持着生命力，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新的发现。

中华文化隐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价值理念，包含着丰富的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各种智慧。本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治理能力的目标，马洪基金会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一书出版为契机，邀请了各位有丰富管理经验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专家学者，从文化传统

中吸收知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探讨对新时代发展的价值。

我与本书的作者殷教授是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老伙伴，看到他的新著，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他的这本书写了20多年，我拿到这本书以后花了20小时进行阅读，形成三点体会。

第一，写成这本书非常不容易，需要“三历（力）”

殷雄是学理科出身的，本科、硕士都是理学，参加工作后又攻读了法国工商管理博士学位，所以他的学历是跨界的。他的经历也是跨界的，在部委当过核工业部部长秘书，又到两个地方去挂职、任职，既当过官员，又在大型企业集团里面当过总经理、党委书记，经历非常丰富。另外，他的研究领域也是跨界的，有翻译、诗歌、文化、经济理论，也有管理专著。我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觉得很厚重，假如作者没有丰富的经历、高深的学历和雄健的笔力这三种“历（力）”，是写不出这本书来。

第二，本书的内容具有“三新”的明显特色

按照中华传统文化的治理智慧，作者根据他的深入思考和本身所具有的知识结构，梳理了一个严谨的思想体系。本书共分五篇，核心内容是三篇，加上绪论和结语，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关于中国传统治理智慧的理论框架体系。概括地说，就是从“旧”的历史事件和“老”的历史叙述中提炼出“三新”，即新的体系、新的理论、新的思考。

第三，本书为读者提供了比较丰富的“三有”

一是“有料”。作者并不是单纯地论述或综述历史的经验教训，而是通过自己的理论思维，提出了非常丰富的六项思想成果，概括为“一二三”。

“一”，是一项社会学定律：“代际衰竭定律”。中国历史上反复发生改朝换代，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后代的精神养分缺乏了，作者形象

地概括为“不知‘艰苦功德’”，即不知稼穡之艰、不知创业之苦、不知节俭之功、不知自律之德。

“二”，是两项经济学定律。

资源配置的“稀缺性法则”：经典力学是量子力学的一个特例，决定性变量是物体的运动速度；市场经济乃是计划经济的一个特例，决定性变量是可供配置的资源量的稀缺程度。

企业经营的五项“黄金定律”：克制欲望，扬长避短，未进思退，现金为王，思想制胜。

资源配置的“稀缺性法则”，最能体现作者的视野广度、知识厚度和思想深度；五项“黄金定律”反映了作者在长期的企业管理工作中的独特体会。

“三”，是三项管理学定律。

政府机构运作的“碎片化效应”：中国历史上反反复复出现的政府职能机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过程，是一个产生社会所不需要的“碎片”的过程。

单位管理水平的“天花板效应”：一个单位或地区的一把手的水平，就是该单位或该地区的水平，再也无法提高了。

更有意义的是，作者还根据《红楼梦》中“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的文学故事，概括提炼出“王熙凤管理八法”，表现出见人之未见的敏锐思维和独特视角。

二是“有用”。这本书一开始确定的题目是《大国之治》，所以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可以感觉到作者的很多视角和论述，都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谈的，但是，实际上这本书对于每一位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甚至个人家庭生活中的管理，都是具有启发和借鉴作用的，因此，我认为这本书是“有用”的。

首先，治国犹如治家，这是《礼记》的精神。用现代西方国家理论来看，国是国，家是家，国是与政治相关的组织，而家是基于血缘关系而成的组织，两者组合而成的“国家”这个词很难用现代国家理论来解释。但是，从本质上说，国是因为家而产生而存在。家是个体，是部分，带有个体色彩，是微观的；国是群体，是整体，带有国家意志，是宏观的；没有家就没有国，家是国的基本要素。国家的出现，正是为了满足千万个家庭的需要。因此，所谓治国，必须以治家为基础，或者说，治家即为治国的出发点。

其实，治国更似治企，这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企业，是由人组成的，它是介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一种社会组织，承担着为社会创造财富的重大使命，这就离不开治理的手段。中国的企业，存在并发展于中国的社会形态之中，当然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环境，在治理企业的过程中就需要借鉴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思想，进而逐步形成有别于西方企业的治理思想、治理制度和治理手段。前文所述的作者的诸多思想成果中，有许多内容和方法都是可供企业管理者借鉴或吸取的。

再次，治国平天下的人文基础，离不开各级各类领导者、管理者的修身养性。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作者在本书的主体结构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而且每每有独特的体会，令读者不由为之击节。比如，作者提出的企业家的五项“黄金定律”，其实就是对企业家个人修养的行动指南，极有参考价值。

三是“有趣”。这里所说的“有趣”，不是像一般观众欣赏一部喜剧那种轻松一笑的有趣，而是阅读之后结合自己的体悟而常常有的那种会心一笑的“情趣”。比如，作者在“有形的辫子与无形的‘辫子’”一节中，讲述了清末一代怪杰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拖着一条辫子走进课堂，引起学生们一阵哄堂大笑。辜鸿铭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辫子是旧中国的象征，虽然头上没有辫子，但如果思想还是像旧中国的迂腐思想一样丝毫未变，那么就如同长在心中的辫子一样，虽然看不见，但仍然顽固不变。辜鸿铭曾告诉国人：“中

国之存亡，在德不在辫，辫子除与不除，原无多大出入。……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西化成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作者举这个例子，表面上看似信手拈来，其实不然，他是有着深刻的思考的，借此说明中国人为什么要有文化自信，以及这种自信的表达方式在“里”而不在“表”。作者由此发出呼吁，中国人脑袋后面的那条有形的辫子已经被剪掉了，骨子里残存的那条无形的“辫子”更应该被彻底根除。读者读到此处，当然会觉得作者的论述是“有趣”的。

作者本人作为一位企业管理者，通过自己的经历和思考，提出一个“三位思考”的方法论范式，这是对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与实践中的“思不出位”的扬弃与升华。作者认为，“思不出位”其实具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忠于职责，就是本位思考，所谓“在其位，谋其政”；第二层含义是坚守伦理，就是换位思考，所谓“不媚上，不欺下”；第三层含义是提升境界，就是上位思考，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这三个层次只要缺少任何一个，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思不出位”。通过对作者这种思辨性论述的咀嚼，读者应该会感觉到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高级“趣味”。

本书除了正文精彩之外，作者的“导言”更是思辨缜密，其为文手法远而近、近而远，点、线、面三者穿梭有致，形式与内容浑然一体，真是难得的好文章，有着极其丰富的思想营养。作者本人在后记中说：“我十分期望广大读者肯花时间阅读本书，因为只有读者的阅读才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大奖赏。”我十分理解作者的心情，认为此书人人可读，人人应读。

□主讲嘉宾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作者、南方科技大学产业教授 殷雄——

文化是国家治理的“基因”

首先感谢谭（建生）总刚才在致辞中对我的鼓励。本书作为我个人二十多年的读书笔记，今天成为有形的成果给大家汇报。令我感动的是，今天在郭（万达）院长的宝地，搞这么大规模的座谈会，我心里非常感激。于（洪君）部长前天风尘仆仆地从北京赶过来参加这个活动，这是对我的极大支持。尤其令我感动的是符开潮先生，他是核电的老人。由于疫情的原因，我们好几年没见了。以前符总每次见到我，都要问：“小殷，最近写了什么东西？”这就是一种无形的鼓励。

这本书读者看到的是有形的结果，但作者的写作动机和成书的过程别人是猜不出来的。我今天主要不是讲这个书本身的内容，而是想讲讲书背后的一些故事。

首先讲动机，为什么写这本书。我是1988年参加工作的，参加工作之后度过一个思想上的空虚和彷徨期，我估计大家刚参加工作都有这样的体会。在学校的时候很充实、目标很明确，通过考试，上研究生就是做完论文、拿到学位，这个目标很单一、很明确，动力也很足。参加工作的初期，就不知道该干嘛，没人管你，尤其是1991年调到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机关的时候，大机关人也多，谁也不认识，没人告诉你未来职业生涯的发展规划。当时半年到一年那个时期非常恐慌，不知道该干嘛。

排走这个恐慌和寂寞的方式就是读书，读书也不能泛读，读什么？我调到机关里还从事过一段共青团的工作，因为我学理工科的，本科、研究生的专业都是原子核物理，在机关是做管理工作的，就要补课，补政治的、哲学的、历史的、文学的。1993年有一个历史性的契机，当时84集《三国演义》在中央电

视台播放，每天放两集，我那会儿在中核总办公厅秘书处值班，每天追剧，我的老首长蒋心雄部长说不用每天看，买光碟礼拜天两天就看完了。

民间对《三国》的故事很熟悉，但是诸葛亮到底是什么人？我们不能以小孩子的那种想法来揣度诸葛亮就是聪明，鲁迅先生说“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当时就萌发了要研究这个人，我是历史人物诸葛亮的粉丝，到现在为止我对他有一些事情还没有研究透。

研究一个历史人物，最重要的是读他本人的著作，一方面是填补空白，另一方面是尽量学以致用。中国人的学以致用也害了很多人，过去读书人就是科举制，“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李世民看着城门下面新进士们走过城门，就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

诸葛亮有两部重要的治军理政著作，一部叫《将苑》，也叫《心书》或者《诸葛心书》，总共是50篇（《兵权》《逐恶》《知人性》等）。当时我就萌发了读这本著作，同时把它翻译成现代汉语。在翻译的过程中萌发了写一点学习体会的想法，这叫探微。人就怕积累，积累几年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东西就出来了。几年后积累出这么一本书，叫《诸葛亮心书探微》，是长春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上下两册。我有一个同学在他生活的城市给我买了一本，我说这是盗版书，他说好几种盗版书，说明你的书成功了，可惜我没有拿到一分钱的稿费，全让那些书商赚钱了。

又过了几年，对那本书进行了修订，出了《诸葛亮治军方略》。当时中顾委的秘书长李力安先生（今年过了春节刚刚去世，102岁），我曾经与他有过一段工作经历。他住在北京万寿路，与我家住得很近，他给我写了一个序，书出版之后很受欢迎。

诸葛亮还有一部著作叫做《便宜十六策》，共16篇文章，我又把它翻译解读，又出了一本书，叫做《诸葛亮治政方略》。诸葛亮的《心书》和《便宜十六策》这两部著作，历史上没有人告诉我们是在什么背景下写出去的。我个人

的合理猜测是，他在第一次北伐失败之后给军队将领进行培训时的授课笔记，这是我的合理猜测，尤其是《将苑》。诸葛亮斩了马谡，自己痛哭流涕、自贬三等，但问题没有解决。这个仗以后还打不打？我们这次犯了什么错误？类似于现在党政干部、企业管理者参加培训班，有老师讲课，我估计是诸葛亮亲自给这些军队的将领们讲课，你们作为将领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便宜十六策》也是，他辅佐先主和后主几十年，有很多心得体会。我觉得《便宜十六策》要么是从政心得、要么是读书笔记，这是我的合理猜测。

随着我工作经历几次改变，自己的工作经验也有所增多，在这个过程中总是有一些新的读书思考、新的读书笔记，于是就想对这本书进行修订。宋代思想家陆九渊有一个“我注六经”或者是“六经注我”的说肖。如果说前面两本书是“我注六经”，就是诸葛亮怎么说的我怎么理解的，后面这本书就有我自己更多的心得体会，有一点“六经注我”的意思。

与此同时，我还有一本书是在谭总指导下我们两个合作的《能源资本论》。这两本书的撰写基本上是同时开始的。任何一本著作必须要有时间的积累，否则是写不出那些“急就章”的。有一个网友说了一段非常恭维的话，估计这位老兄认识我，向大家声明不是我找的托。有人表扬，我心里还是很高兴的。他说《能源资本论》是人类社会的物质资源，《治理智慧》则是大国治理的文化资源。我转述这一段，有点炫耀的意思，同时也说明这两本书有人读。

我的思想受到触发，是因为一份《世界能源导报》的报纸。我于1988年刚参加工作，所在的研究所准备成立一个经济研究室（后来分出去成立了经济研究所），就出了这份报纸。当时这个报纸很受中央领导同志的欢迎，邹家华副总理每周都要让秘书索要这份报纸。我家里有截止到2002年完整的合订本。我写《能源资本论》的时候，参考的资料有1米多厚，原来想用西方数理统计的方式，最后还是回归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这个路子上，因为弄一堆数据，最后算来算去还是那个结论。

有了资料积累，还需要进行理论准备。这是我精读马克思的三卷本《资本论》的读书笔记，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读书就是这么读出来的。人的脑子里时刻有很多想法，这些想法就像我们平时在天上看到的浮云，如果你不能把这些“浮云”及时地捕捉下来，停一会儿它们就没有了。因此写著作的人一定要做一个有心人，时时把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过几天一翻记录，可能对你有其他的触发。

我回顾自己进行理论准备的过程，还要特别感谢一个人，就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核情报研究所所长贾致泽。他是50年代留学苏联的，我调到总公司机关之后，贾所长有一次给我打电话，能否给他的孩子辅导一下数学。这个孩子的妈妈是中学物理老师，物理和化学不需要我辅导。我当时很干脆地说可以，因为我已经调到总公司机关了，不在所里，因此不存在对领导有溜须拍马之嫌了。有一次给他孩子讲完课后，贾所长与我闲聊时说了一句话，马克思这类人都是很博学的人。他的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在我们所长的脑子里面，博学的人是有地位的，当时我记得还有一件很小的事，欧盟委员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在荷兰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他问他儿子知不知道？他儿子记不住，我炫耀了一下，脱口而出说出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他指着他儿子说，你看人家小殷叔叔可以脱口而出，昨天我还让你看你都没有记住。贾所长所说的“博学的人”，好像在我麻木的神经上刺了一下，我就下决心好好读书，当多大的官不是追求，还是要做一个博学的人。今天我坐在这里讲这件事情，我脑子里出现的是当时我的老所长怎么跟我说的。他退休已经很多年了，80多岁了。

在进行理论准备的过程中，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经济学笔记》，厉以宁先生给我写了一个序。我在贵州毕节挂职的时候写了一本《非常责任》的书，也请厉先生给我写了一个序，因为我在毕节那个地方挂职，厉先生当时是毕业生生态开发实验区的专家组的组长，是当时的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请他去的。由于有这层关系，厉先生就给《非常责任》写了序言，还把他的一首诗加进去，我记得最后一句是“不信青山不聚财”，我知道他这句话是点化宋朝诗人王令的

“杜鹃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句子。事实上，中国人很多诗都是点化古人来的。

今天早上在来这里的路上，我突然想起范仲淹当年给严光写的《严先生祠堂记》中结尾的几句话：“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厉先生今年2月27日去世了，我们今天在这里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我就想以这种方式 and 这几句话表达对厉以宁先生去世的哀思。

提到范仲淹这个人，他在《严先生祠堂记》里面还有两句话，他说：“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这个“微”字，使我们想起范仲淹在《岳阳楼记》最后一句“微斯人，吾谁与归”。我们说，文如其人，通过这个“微”字，我们就能感受到范仲淹的文风和品格。当然，这个“微”字也不是范仲淹发明的，是孔子说的，“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披发是披头散发，左衽就是向左开衣，大家看一下自己穿的衬衫，有谁的衬衫是右边压左边的？都是左边压右边，这叫右衽。这就是文化。在孔子看来，如果右边压左边那是一种受辱，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对今天的中国人衣食住行各方面仍然有隔不断的影响力。

我不打算把这个书的内容全给大家汇报，只是说说基本的内容框架，基本上是一个三角形的结构。因为我是学理工科的，知道立体几何中的三角形是最稳定的。除去绪论和结语共16章，分三个维度：制度与风气、方法与内容、素质与能力，正反两方面的思考都有了，加上序论和结语正好18章。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十八般兵刃”，治国理政有这十八般兵刃够了，历史上国家治理得好，是这十八般兵刃用得好，治理得不好就是用得不好。如何用，有一个灵活的问题，我与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南宋一开始抗金的主要将领叫宗泽，岳飞带领一些人投他去了。岳飞很会打仗，宗泽很喜欢他，慢慢就提拔他当统制（类似于现代军队中的少校军官）。宗泽对岳飞寄予很大的期望，平时注意指导他，有一次对他说：“尔勇智才艺，

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万全策。”就是说岳飞喜欢野战，对古人的兵法、阵法不太讲究。岳飞也不是对老首长的话予以奉承，而是讲出自己的观点：“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宗泽一听十分高兴，认为以后振兴大宋基业非此人不可。后来岳飞的命运很惨，那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因素把他害了。

如果说，本书的三角型结构是一艘船，那么我今天主要不是讲这艘船的结构，而是重点讲一讲这艘船所行驶的环境，大海、周围的空气是什么样子。

中国传统治理思想与实践有两大基础环境：第一个叫政治环境，也叫社会环境，它是以君权神授为基础的家天下权力结构，实施君主“唯我独尊”的独裁体制。从秦皇汉武一直到明清，都是君主“唯我独尊”的独裁体制。第二个是经济环境，也叫自然环境，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农耕经济结构，它追求的是稳定，因此历届政府实施的是“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重农抑商”这个政策是实的，不是虚的，比如汉代商人不能坐车、不能骑马，商人旅行只能走路，想骑马、坐车只能偷偷地进行。如果忽视了这两大环境，所有议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论点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解开中国传统治理之谜有两把钥匙：第一把是集权体制，君主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以维护家天下的利益来源。春秋之前是天下为公，慢慢随着社会生产产业的发展、物质产品丰富起来了，需要以新的方式分配，就出现了商业环境和利益之争。怎么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就是“君权神授”的“家天下”。

第二把钥匙是制衡机制。君权和相权相分离，使朝廷制订的政策能够得到贯彻执行。皇帝决策之后要有人给他干活，政策才能够得到执行。说起中国历史故事，很多都是关于君权与相权之间的争斗。秦汉时候宰相的地位很高，权力很大，有“拜相”一说，皇帝选了新宰相，任命仪式非常隆重。汉代宰相和皇帝说话是面对面坐着，到了唐宋皇帝坐着、宰相着，到了明清宰相要跪着，所以传统封建社会君权、相权之争越来越激烈，相权为什么低了？就是要保证

皇权的神圣性。这种制度越来越走向腐朽，因此，1911年辛亥革命将封建帝制推翻，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一般而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宰相是管仲。孔子有一次与颜回开玩笑说“使尔多财，吾为尔宰”，你要是发了财，我愿意给你当账房先生。宰相做什么？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汉文帝有一次问右丞相周勃。周勃是一个武将，因为他平定七国之乱有功，所以把他封为右丞相。古代是右为上、左为下，官员说左迁就是被贬职了、右迁是高升。皇帝问他全国的案件数量有多少？周勃说不出来；皇帝又问每年税收收入有多少，他也说不出来，急得汗如雨下，汉文帝就不高兴，问左丞相陈平，陈平也不知道，他说案例多少你应该问廷尉，收入多少你应该问治粟内史。汉文帝就不高兴了，你作为丞相管什么？陈平有急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了一段忽悠的话：“丞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职也。”把汉文帝说得高兴了。朝会结束后，周勃抱怨陈平怎么不早点教他，陈平说你自己不会说关我什么事。其实陈平这段话完全是情急之下的忽悠，什么叫上佐天子？怎么佐法？什么叫阴阳？怎么镇抚四夷百姓呢？无非是情急之下忽悠皇帝。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类似这种忽悠的事很多，比如说宋代的张载，所谓的“横渠四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说什么呢？谁知道？我在这本书里面引用了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对这四句话的解释，还是把它当作知识分子心怀天下，有家国济世情怀的正面形象，但是实际上这几句话不明所以，他自己也不知道说些啥，什么叫为万世开太平？怎么开法？

以上就是解开中国传统治理之谜的两把钥匙：集权体制和制衡机制。

中国历史上历次的改朝换代，改什么，争什么？改的是一家一姓，争的是统治国家的权力，这就引出来另一个话题。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分为道统与法统。这两个词对今天的大多数

读者有点生僻。道统来源于春秋以来所形成的大一统的观念。汉代大儒董仲舒写了一本书《春秋繁露》，把这种观念系统化、理论化、框架化了。统者，一也；一者，正也，这就是正统。

关于道统的概念，与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唐宪宗对佛教非常着迷，迎佛骨，建佛塔，劳民伤财。韩愈很反对这种行为，他写了一个奏疏叫《谏迎佛骨表》，劝皇帝把这个东西烧掉，如果佛祖要降临灾难，就让我韩愈一个人来承担。皇帝很生气，把他贬到广东潮州。他的侄孙韩湘（八仙韩湘子的原型）送他的时候，韩愈写了一首诗送给他，“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韩愈还写过一篇文章《原道》，虽然没提“道统”这个词，但是他认为唐尧虞舜、文武周公到孔孟一脉相承，这个就是文化的道。韩愈认为500年出一圣贤，到了唐朝又该出现一个圣贤了，韩愈就自视为儒家圣贤的传承者了。宋代的大儒朱熹整理确立了道统这个名称，承认韩愈说的唐尧虞舜到周公孔孟，认为“道统之传有自来矣”，来源就是从春秋传下来的以儒家为核心的思想体制。

法统，就是统治权力的法律基础。历来的改朝换代争夺的是法统、维护的是道统。所谓道统，就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法统是治国理政的法律来源。道统和法统这个词近代很少见。我举两个例子说明。

关于道统。乾隆年间，乾隆皇帝认为北方很少出状元，而北方的读书人也不少，这样不太好。于是，他就点了一个陕西的士子王杰作为状元。我们现在在网上还可以看到王杰的书法，写得好极了。王杰被点了状元，山东的学子不服，写了一个上联：“孔子圣，孟子贤，自古文章出齐鲁。”王杰也毫不含糊，对出一个下联：“文王昭，武王穆，而今道统出西秦。”昭穆，古代帝王修家庙，左为昭右为穆，或者第一代为昭，第二代为穆，第三代为昭，第四代为穆，叫做昭穆制度。王杰说“而今道统出西秦”，你们山东的文脉不行了，现在的道统出在西边的秦国。其实王杰谦虚了，西秦的道统何止是“而今”，完成中华历史大一统历史使命的就是秦国。

关于法统。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即将全面失败，蒋介石发表了一个元旦求和文告，提出五条求和要求：所谓“中华民国”的宪法不要违反、宪政不要破坏、政体能够保持、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切实的保障。毛泽东则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明确提出了“废除伪宪法、伪法统”。这是人们见到“法统”词汇最近的一次。

联系一点实际，这次马英九大陆之行的名义是清明祭祖，他只提和平奋斗、振兴中华，而不提怎么样实现和平。他举了两个例子，我认为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不怎么得体。

第一个例子，他说两部宪法（指《中华民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说一个中国，这就暗含了他还是在维护所谓“中华民国”的法统。

第二个例子，他谈到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涉及到一战时法国与德国之间的领土争端。但是，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不是德国与法国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他还引用他的祖先的一副对联“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有些媒体对此讲了很多奉承的话。其实，前一句是对的，黄金是黄金，书是书，两者不同；后一句的本意不错，他是想鼓励人们做善事。但是，如果我们抠一抠字眼，这个联语是大有问题的，万事不包括“行善”这件事情？中国人所说的“万”是泛指，可以理解为“所有的事”，那样说来，行善这件事也是万事中的一件。前一句是两个事物，后一句则是万事中包括了“善”，因而是一件事情，从对联的角度来说，就不是“工对”，也就是说，这副对联的水平并不像一些人说的那样有多么高超。

由此，我联想到1937年4月国共两党共同祭典黄帝陵的两篇祭文，其水平相差太大。毛泽东的祭文，大气磅礴，结合当时的抗战，提出了原则、方针、方法和结果，给当时的国人以方向和勇气；而国民党的祭文则是老生常谈，其中涉及抗战的只有一句“保我族类”。从两篇祭文的水平，就可以预测出国民党是一定要失败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是运与气。运是天干，气是地支，王朝的更迭是气，是法统；文化的兴衰是运，是道统。我们说王朝的气数已尽，说的就是它的法统，统治基础薄弱了。一个王朝的法统几百年之后也要灰飞烟灭，法统是偶然性与特殊性，而一种文化的道统可以延续几千年而不中断，它是必然性与普遍性。

中国文化还有守正与创新的双重特质。守正就是顽强，举一个小例子，明朝朱元璋读《孟子》，孟子讲的一些话他不爱听，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朱元璋说，此老儿如果活在今天非吃我一刀不可。他就让人修改《孟子》，并且把孟子的配祀塑像从孔庙里面逐出去。当时的刑部尚书钱唐冒死进谏，他要进皇宫大殿向朱元璋面呈他的意见。朱元璋对执金吾说，如果他进来，就直接给我射。小太监跑到宫门口，挡住钱唐，说钱尚书你不要进去，皇帝正在生气。钱唐推开小太监，进了宫门。朱元璋看到钱唐果然进来了，就命令卫士射箭，钱唐的胸脯和腿都中了箭，但他忍着伤口的疼痛往里爬。钱唐的这个壮举，使朱元璋这么一个暴君也受到了震撼，下命令说赶紧请太医来。后来有一个大学子叫刘三吾，83岁了，白发苍苍，还是修改了《孟子》，这就是后来的《孟子节文》。在那种封建专制统治下，还是有一些知识分子要维护中华文化的道统，冒死进谏，这是一种精神力量。

创新就是包容。明宪宗朱见深画了一幅《一团和气图》，左边带着冠的是传统的儒家形象，右边束着头巾的是道家的形象，两者合起来，是一个笑迷迷的佛家形象。明宪宗不希望各家各派总是争来争去的，还是一团和气的为好。实际上，一团和气就是一种创新的必备的思维逻辑，不包容怎么可能有创新呢？不包容就没有创新。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有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两分法”。盛世与乱世，鲁迅说，封建社会所谓的乱世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年代，盛世是想做努力而做稳的年代。明君和昏君，明和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忠臣与奸臣，忠是忠于人民还是忠于皇帝？比如说明朝严嵩，他对万历皇帝很忠，你说他是忠臣还是奸

臣？清官与贪官，一般的老百姓认为清官好、贪官就不好，清末有一部小说叫《老残游记》，鲁迅特别推崇，小说讲的就是清官的为害之烈，清官打着“清廉”这个旗号做的事简直惨不忍睹。君子与小人，这是孔夫子的概念，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小人？这个概念很难解，儒家有许多说法，比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成人之美，小人成人之恶”等等。

说到君子与小人，我最近读余秋雨的《行者无疆》，里面有两段话我很喜欢，与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段是，“历来糟践人类文明最严重的人不是暴君、不是强盗，而是围绕在创造者身边的小人”；第二段是，“请不要小看小人，他们是种种伟大的消解者，消解的速度远远超过当初的建设”。

中国还有三种独特的官场文化。三国有一个文学家叫李康，他写了《命运论》，其中这几句话大家都熟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个实际上就是人性。这三种独特的官场文化是隐士文化、贬官文化和忌妒文化，好与不好很难讲。比如说贬官文化，没有贬官就没有苏东坡这位宋代的文学大师，也没有今天海南岛的五公祠。忌妒文化，孔子本身就是忌妒的受害者，他到了楚国，子西和楚王说，你敢不敢用他？最后楚王不用他了，最后孔子对子西的评价是“彼哉！彼哉！”，就是“这个人啊、这个人啊”，说不出来什么。

中国历史上对儒家文化的道统一直不缺少批判性的思考，今天我们不展开，只是举几个例子。明代哲学家李贽说“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否定孔孟学说是“道冠古今”的“万世至论”；李鸿章说“我却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数器艺来”，“孔子不会打洋枪，今不足贵也”。梁启超针对孔孟、特别是孟子的仁政，说儒家对仁政“只能论其当如是，而无术以使之必如是”。毛泽东当年在一首送郭沫若的诗中说“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这些都是对儒家文化道统的批判性思考。

本书有六项思想成果，概括的讲就是“123”，“1”是一项社会学定律，

就是“代际衰竭定律”，为什么有改朝换代，就是代际衰竭；“2”是两项经济学定律：一个是资源配置的“稀缺性法则”，一个是企业经营的五项“黄金定律”；“3”是三项管理学定律：一个是政府机构运作的“碎片化效应”，皇权统治的国家，一代一代的王子王孙越来越多，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导致经济结构发生了崩溃，这个王朝产生了许多“碎片”，就会影响统治的有效性，因而是一定要灭亡的；单位管理水平的“天花板效应”，一个单位或者一个地区一把手的水平决定了这个单位和地区的水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传统治理文化要求明君贤臣的道理，只有好人才能把这个事做好，人是坏的，好事也做不好；王熙凤“管理八法”，我认为《红楼梦》第13回最精彩，其次是刘姥姥两次进大观园，那个对中国封建社会刻画的是非常精准的。王熙凤“管理八法”把中国式管理说透了。根据我本人的经验，概括了八字箴言“无私无畏、敢抓敢管”，搞过管理的同志就知道，什么科学方法、艺术，这个东西都很难说，就是“无私无畏、敢抓敢管”。

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说“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这就回答了为什么要学历史。我们说，旧，总是孕育着新，新，总是脱胎于旧，但是我们又不能搞庸俗的社会进化论，认为新总是好的，旧就不好，比如我们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先秦的那些思想，现在很多人的思考也达不到那个水平。

治国没有偏方，理政也没有秘方。一种制度和一种文化即使是合理的，也并非意味着它们是必然的，它们今天只能如此，更不意味着它在将来会一直如此。

谭总送过我一本书，叫做《政治秩序的起源》，作者是写《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的弗朗西斯·福山，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刘瑜，他写了一个导读，他说“历史往往意味着路径依赖，意味着制度惰性，意味着文化惯性，而对历史的超越则更取决于人们刻意的选择和逆水行舟的努力”，这个话是对的。

美国有一个管理学家叫胡克，他说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今天，我们就

不能怪孔夫子，更不能怪秦始皇，怪就怪我们自己的选择。

在谈到中国式现代化，最近于（洪君）部长发了好几篇文章。我个人认为，首先要有与时俱进的现代意识，通过现代的技术手段实现治理现代化，进而实现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人的解放，不能在思想上有什么禁锢。

观察或者评判现代化有两个视角，一个是问题导向，一个是实践维度。我认为，中国要永远坚持改革开放这个总路线，谁都不能变，中国必须向世界敞开胸怀，只有接纳世界，才能表达世界。

最后落实到今天的主题，我们的结论是：文化高于种族和疆域，文化超越时间和空间。

□演讲嘉宾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 于洪君——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新书发布 暨治理思想研讨会上发言

很高兴能够来到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应邀出席贵院举办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一书发布会暨治理思想研讨会。我与大家一样，对殷雄先生长期致力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锲而不舍，硕果叠出，感到由衷的钦佩。对殷雄先生这部力作在治国理政不断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时刻适时问世，表示衷心的祝贺！

我与殷雄先生结缘是在2018年。当时，我的好朋友谭建生先生给我寄来了他与殷雄先生联袂出版的《能源资本论》。通读这部既属于能源学又涉及经济学的“鸿篇巨制”，我与殷雄先生成了交流甚欢的学术益友。殷雄先生博学多

才、通展古今、长于思考的智者风范和治学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2020年，殷雄先生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一书的初稿《大国之治》寄给我，请我阅评。我阅后掩卷，长思不已，又一次被这部“文明学”与“文化学”特点兼具的力作所震撼，不由自主地为作者的思想深邃而赞叹。

众所周知，人类文明是多元共生、彼此平等，相互影响的。源远流长而又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无可替代的独特地位和影响。数千年来，华夏大地演绎了一幕又一幕从分裂到统一、从统一到分裂、再从分裂到统一壮丽史诗，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一脉相承，延续至今。其中的复杂原委与深刻道理，殷雄先生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探究。他从中华民族合久而分、分久必合的历史经纬中，从先圣哲人治国理政的丰富思想与宝贵实践中，发掘出中华民族国运昌盛的遗传“基因”，总结出“法统”与“道统”彼此互动与中华文明赓续不已的辩证关系，充分彰显出作者独有的视野广度、知识厚度和思想深度！

中国社会历来有事功与学术之分。从本质上讲，事功与学术并无矛盾，二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从职业上说，殷雄先生主要从事技术、业务和管理的工作，而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但他将工作与学习相结合，将实践与思考相统一，将历史与现实相关联，将工作之余的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诗词创作和著书立说之中。透过这些有形与无形合而为一的思想成果，透过他的博学与多思、探索与追求，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职业生涯和精神生活坚定向往、不懈追求的人，一个既是学者更是行者，某种意义上也是智者的人。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体制，非常尊崇理论联系实际，历来赞誉知行合一。在我看来，本书作者就是这样一位身体力行、励志永恒的学者型管理人才，或者用目前流行的说法，是一位学者型领导干部。

作者这部旁征博引而又言简意赅的著述，有许多思想创新。譬如：代际衰竭定律，是一个社会学定律；企业经营五项“黄金定律”，是一组管理学定律；

资源配置的稀缺性法则，是一个经济学定律；政府机构运作的“碎片化”效应和单位管理水平的“天花板”效应，属于管理学范畴。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他把“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的文学故事，概括为“王熙凤管理八法”，表现出见人之未见的非凡思路和独特视角。他将许多看似非常简单的道理，上升为一般的理论，归纳出“定律”式的结论。社会所需要的学术研究的价值与功效就在这里！

近些年来，世界力量对比与战略格局重组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特点极为突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事业虽然也遭遇不少困难和挑战，但总体上高歌猛进，成就斐然。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接近于全面复兴的伟大目标，中国人民也前所未有地接近于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华民族所处的近现代最好时期，与人类社会面临的百年未有大变局，相互交织，彼此激荡。中国的国家治理，与全球共同治理，自然而然地既彼此牵动，又相互影响。中国需要世界与世界需要中国的国际共识，从来没有向今天这样广泛而坚实。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走向中国的良性互动，从来没有向今天这样步履铿锵，势不可挡。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秉承既为中华民族谋福祉、又为人类社会谋大同的伟大初心，一方面带领中国人民全心全意地开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又充分履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的历史责任和国际使命，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在推动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赤字、和平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仍有增无已。面对“四大赤字”相互叠加、积重难返的国际关系现状，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网络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这些引领时代潮流的伟大倡议，无一不闪耀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实践经验的思想光辉。习近平提出这些倡议时援引的一些古训，譬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德不孤，必有邻”“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等等，无一不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换言之，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民族为全球治理提供的中国方案、中国理念、中国经验，无一不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的智慧之光。

作者在本书中表现出的大开大合的思维方式，反映出了当代中国人胸怀天下的时代情怀和品格。如今，我们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就是要放眼整个世界，努力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所有优秀文明成果，而不仅仅限于中国的自身文化和文明成果。这也正是文化创新、文明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

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史的中国走向国际舞台中央，这是世界大势，也是历史必然，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不断发扬光大中华文化的持久渗透力和国际影响力，就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走向中国的辩证统一。

为此，我们要像作者所说的那样，从中国传统的治国理政文化中吸取丰富教益，以“有鉴于治道”。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大博弈中，凝聚战略定力和时代智慧，从无比丰富而又具有创新特质的中国文化中汲取治理思想，获得精神营养，增强文化自信。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传承中华文化优秀“基因”，推动中华民族在世界大变局中铸就鼎立千秋的大国格局，这是我们的共同意愿和永久追求，也是我们庆贺殷雄先生大作问世的本意所在。

中广核集团专职董事 余志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新书发布 暨治理思想研讨会上发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就此议题做出决定，明确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

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毫无疑问，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同时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我问作者出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与党中央部署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他说纯粹是时间上的巧合，我想这也许是作者本人谦虚。在这个事情上，我个人有自己的一些理解：所谓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实际上就是呼唤国家制度体系的创新，历史上秦朝和隋朝都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做过非常好的制度创新。所谓提升治理能力，实际上就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以及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无论是创新制度，还是执行制度都离不开几千年发展形成的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习惯。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的出版对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是极具参考意义的。

人类形成社会组织之后，治理就成为必要！

中华文明延续几千年，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治理思想和治理实践，有些时段治理得好，国家就走向强盛；相反，如果在治理方面出现问题，国家就走向衰败甚至战乱。作为中国人，我为中华民族光辉灿烂得历史感到自豪。同时，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也被中国历史上一些特殊阶段所感动。这些特殊阶段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中华民族血脉的延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揭示了统治者治乱兴衰的得失。

第一，秦帝国历二世而亡。

秦国有近700年的历史，经历36代国君，是一个非常励志的王国。最初秦国不在周天子分封的行列，直到100多年后，周平王东迁洛阳，才正式得到分封，位列诸侯，可是封地还是沦陷区。经过140年的奋斗，终于收复失地，并称霸西戎，此时才能与中原各国平起平坐，秦国的发展历史真是有血、有泪、

有心酸。后续君主继续励精图治，发布求贤令，实施商鞅变法，国势日强，终于先后攻灭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秦帝国。统一六国的战争，秦国可谓是秋风扫落叶，仅仅用了11年的时间。但是帝国建立14年后，轰然倒塌，居然灭亡了，不存在了。怎么解释？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秦国为什么能统一六国？前面讲了一些，不再展开了。

二是秦帝国为何如此短命？有人认为是亡于政治，而非亡于制度。有人认为秦朝“太残酷、太热烈、太劳累了”。有人认为秦朝过于相信武力，忽视了人民群众的诉求，因此而失去了民心。不管是哪种意见，我觉得上述分析都对今天有参考意义。

第二，汉匈战争其实是汉民族立国之战。

汉初，匈奴帝国是强大的。汉初，大汉王朝是虚弱的。但是经过文景两帝的“无为而治”，和汉武帝的“大有作为”，汉朝不再忍让了。经过五次汉匈战争，收复了河套地区，夺取了河西走廊，将汉朝的北部疆域从长城沿线推至漠北。相对而言，失去阴山、祁连山以及河西草原甘美的土地，匈奴帝国的命运就悲惨了，完全失去了对汉朝的威胁。汉匈战争的意义是深远的。

也就是通过这场战争的胜利，汉朝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算是立住了，否则“五胡乱华”这段历史会大大提前。为什么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汉朝和匈奴之间能够实现强弱易势，攻守转换？首先双方的文明程度有差异，匈奴还是蛮族。其次，国家治理能力上是有差异的，匈奴的国家整合度差一些。第三，是汉朝几位君主都比较英明，他们有战略，有耐心，有勇气，他们知道双方实力的差距，所以一直忍耐，直到汉武帝时代还在忍耐，但一旦实力具备便不再犹豫，倾全国之力主动出击，并一击而就。使汉朝成为真正的强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第三，大唐，中国人心目中最强盛的王朝。

毫无疑问，大唐是一个世界性帝国。从东南西北四个都护府的位置就可以

看出，其辖境早已超出了中国版图。安东都护府位于平壤，安南都护府位于河内，安西都护府在新疆，安北都护府位于漠北。尤其是安西都护府，其管辖的范围包括今天的中亚，以及伊朗和阿富汗的部分地区，直接与伊斯兰帝国相接。有人说，唐朝人过的是世界性的生活方式。虽然今天已无法复原当时的生活但从一些侧面可以得到印证。长安街头，外国人很多，3万多名留学生，其中日本留学生就前前后后来过1万多人。留学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朝鲜人、日本人和阿拉伯人都曾考中过进士，仅仅在唐代晚期，得中科举的朝鲜士子就有50多名。唐朝有不少将军就是胡人，名将高仙芝是高丽人，安禄山是有阿拉伯血统的中亚人，尉迟敬德是新疆于阗人。考中进士的外国人还可以做官，比如有一位波斯人和一位日本人就分别被派往拜占庭和日本做大使。

总之，唐朝是开放的，“长安人过着一种没有国界的商业生活”。事实上，唐朝的民族政策就是如此。比方说，下嫁公主宗女，开放边境贸易，招募外族豪酋到朝廷任职，鼓励戎狄子弟到中国留学。而且，对外族人在任命、赏罚、安置和抚恤诸方面，都与大唐子民一视同仁。

大唐为什么会这么强盛？有人认为根本原因是有着令人羡慕的文化优势，古老的中华文明，在经历四百年磨难后，（也就是经历魏晋南北朝这个大分裂大动荡时期后），又被五胡，尤其是鲜卑注入新鲜血液，从而兼具了农业民族的沉稳和游牧民族的血性，焕发出新的活力，比当年的两汉更加优质和强势。

其次是混血王朝特有的开放和包容。开放是指对外族开放，任何人都可以来，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包容是指在国内实施相对宽容的政策，任何外来文化都能为我所用，国民完全可以各取所需，没有限制，没有区别没有条条框框，没有清规戒律，只有博大胸怀。这是一个世界帝国的自信，这叫大国风度！

我选择回顾这几段历史，还是有自己的一些考量，实际上就是对国家发展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考。从治国理政的角度，归纳一下，就是以下几点：

一、在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考究方面，普通民众和政府是有差异的。政府不能“太残酷、太热闹、太劳累”，民心民意不可违。

二、面对外部强权，除了战略定力和耐心外，关键是斗争精神，一旦时机成熟，就要敢于亮剑，竭尽全力，奋力一击。

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要特别注意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并与中华文化进行融合，促进文化改造。在进入世界舞台中央后，要特别注意开放和包容，要有大国和强国的自信和风度。

最后还是要特别感谢殷总，正是因为他的大作，引发了我对中国历史的一些思考，同时有机会与社科文化届朋友交流。这样的交流让我受益匪浅。

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黄发玉——

一部研究治国理政的力作

治国理政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非常现实和严峻的课题。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如何治国理政，都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三年新冠肺炎疫情更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多年前，中央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世界各国也都在探讨如何更好治国理政的问题。就治国理政撰写专著，不仅对国家的治理，对基层、对企业的治理和管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衡量不同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提供了一个评判的思路。

殷雄先生经过多年的努力，撰写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这么一部大作。大作视野宏大、内容丰厚，涉及政治学，历史学、文明学、文化学和管理学诸多领域，洋洋 45 万字，其论述跨越古今，横贯中西，旁征博引，蔚为大观。据作者后记所言，本书是在 20 多年学习、研究和思考的基础之上写作完

成的，可谓用心良苦，厚积薄发。作者的主要工作是从事管理，是与人、与技术、与经济活动打交道，并没有太多的时间思考学术问题。但是他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拿来读书、写作（鲁迅语），这种孜孜以求的精神，这种甘坐冷板凳的精神，非常值得学术界的一些专业人士学习。

该书的主题十分明确，这就是探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这种治理智慧不仅有益于宏观的治国理政，而且有益于当下的社会治理、基层治理和企业管理。该书正文前有于洪君先生和作者本人分别撰写的《序言：在中华文化中寻觅大国治理的根由》和《导言：文化是国家治理的“基因”》，书末附有濮继龙先生撰写的《扬中华文化之光，寻现代理政之策》。二序一附不约而同地认为，文化是治国理政的根本和基因，这就抓住了治国理政的“牛鼻子”，统摄了全书的主线或主题，对全书形成了一种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作用。只有从文化的角度，才能正确理解当下国人治国理政的方略和特点，才能正确评判世界各国治国理政的得失和优劣。这也同时告诉我们，要挖掘传统文化的精髓，创造性地建立现代治国理政的制度体系，才能真正增强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作者正是围绕着这一主线展开论述的。全书正文分为绪论、制度与风气、方法与内容、素质与能力和结语五大部分。五大部分从不同的侧面详细展开，对治国理政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

实际上，治国理政不仅要从文化上寻找其根基和根源，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儒家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伦理文化，就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文化。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首先是儒家的仁政德治，所谓以德治国，仁者爱人；所谓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所谓修齐治平，治国必先修身；所谓仁义廉耻，国之四维。其次是法家的依法治国，也就是通过建立和实施严格的法规来治理国家。所谓赏罚分明，九罚一赏，轻罪重罚，以刑去刑。其三是道家的“无为而治”。也就是“道法自然”，遵循客观规律而为，不妄作为。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治大国若烹小鲜，不折腾、少扰民。该书对这三种基本的治国理政思想都进行了相当充分的讨论，

对其中的精华都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这三种治国理政思想都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期主导或影响了我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当下的治国理政和基层管理。当然，作者也明确指出，这三种治国理政的思想都有其历史局限性，我们都要吸取精华，古为今用。

纵观全书，有三大鲜明特色：

一是思想性与逻辑性统一

全书不是平铺直述，纯粹罗列和展示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料，而是在消化吸收传统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提出了作者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包括历史发展的“代际衰竭定律”、政府机构运作的“碎片化效应”和企业经营的五项“黄金定律”等。更主要的是全书有其独特的逻辑思路，作者把治国理政的逻辑起点归结为权力的起源或者说权力的赋予，这是非常有见地的。治国理政的本质和核心是权力问题，其逻辑起点就是权力从何而来？然后是如何分配权力、如何运用权力、如何约束权力等。这里涉及到权与利、君与臣（上级与下级）、官与民（朝廷与江湖）、家与国、动与乱（战争与和平）、安与危、隐与仕、德与法、赏与罚、天下与国家（治国平天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诸多关系问题，而最后的落脚点是修身，所谓修齐治平，权力的掌握者只有修身（当下我们所说的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才能治国，只有治国才能平天下等等。这些问题在书中都得到了较好的讨论，给我们以很多的启示。

二是学术性与可读性兼顾

本书涉及到很多古籍资料，甚至涉及到夏商周时期的一些文献，比如《尚书》中的“三载考绩，三考”之类。通过挖掘这些古代文献中的治国理政思想，来研究和总结当下的治国理政（包括基层治理和企业管理）实践，这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学术性。这些文献艰深古奥，普通读者阅读起来可能有一定的难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做了相应的技术处理，其引文大多用白话表述，读者阅读起来轻松流畅，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这对于准确理解古人的

治国理政思想，对于扩大本书的影响，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三是历史性与现实性结合

作者长期在实际部门工作，长期担任企业的领导，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又有特别真挚的家国情怀。因此，本书一方面是探究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思想，通过剖析历史上的一些经典案例，从中吸取营养，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另一个方面也着力于对自己多年管理工作的理论总结，对当下社会治理、基层管理、企业管理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因此，除理论工作者之外，基层领导干部和企业管理人员，阅读此书都应该有一定的启发和收获。

总之，该书明确地告诉我们，无论是宏观的治国理政，还是微观的社会治理、企业管理，都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思想资源，也都应该在传统治理思想的基础之上进行创新。本书为我们进行这样的守正创新，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蓝本。

中国企业大学联席会主席 贾晶——

数字经济时代中华文化的弘扬与创新

中华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历代先人智慧的结晶，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蕴含了深邃的哲学思想、价值理念，包含着丰富的治理国家和治理社会的各种智慧，而数字经济时代又赋予我们新的历史使命。本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治理能力的目标，马洪基金会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一书出版为契机，邀请到了中国企业人才发展智库首席顾问，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后，博士研究生导师贾晶博士从文化传统中吸收知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探讨对新时代发展的价值。

贾晶博士从“数字经济时代治理思维的重塑”和“治理过程与中华文化弘

扬创新”两个方面阐述了治理研究的相关内容。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务必围绕当今数字化发展大趋势，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思维，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治理思想智慧，真正把中华传统治理智慧传承下去、弘扬开来，从而推动中华文化的弘扬和中国高质量现代化的发展。

第一，数字经济时代要求我们重塑思维。

我们所有的研究都是时代孕育的产物，我们当下的数字经济时代下谈治理，第一要务是思维重塑，所有的人都必须跟上“数字中国”的大势，重新构建我们的数字时代的思维，才能真正赋予研究和治理更多的普适性和时代和谐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持续深化，新一轮科技变革方兴未艾，全球产业链趋向本土化重构。作为以数据为核心要素、以数字技术为主要手段、以互联网为重要载体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正全面融入人类社会各领域。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之一，是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助推引擎。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实现跨界发展，打破时空限制，延伸产业链条，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重塑思维，打造新时代下的数字经济思维方式。

第二，治理过程与中华文化弘扬创新密不可分。

治理跟管理不同，治理要有法，强调的是过程，管理是一定要赋权，谈的是方法，所以国家治理一定是以中华文化为基础，把数字技术，经济、政治、文化、生态融合在一起的体系构建。

一个时代往往发轫于某个标志性的技术，经历技术创新、技术革命，最终形成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综合生态，这将长远的影响到未来治国理政的智慧。改革开放前20年我们称为“洼地经济”，时代标志事件有下海赚钱，互联网时代，这些都在连接经济，成就交易。接下来的时代是科技时代，科技

赋能，科技爬坡登高才能立足时代，时代中致胜。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句话表达了辩证的观点，无论感知的最好还是最坏的，我们唯有充分理解并契合技术和文化赋予的时代特性才能在这个最好的亦或是最坏的时代里成就最好的未来，所以“沿着旧地图一定找不到新大陆”。我们铭记习总书记提倡的“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治理、思想智慧，真正把中华传统治理智慧传承下去、弘扬开来”，这个时代的使命光靠几位学者远远不够，要靠我们所有人的力量，从不同的视角探索不同的风景，所有不同的风景方可拼凑出一幅伟大的蓝图。

最后贾晶博士以：“当你的努力与时代同步时，你就会对社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这句勉励自己的话作为结语。

《马洪基金会专刊》是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编印的内部参阅资料。

- ◇ 读者群为基金会上级领导部门、理事和名誉理事、智库百人会专家学者及其他机构、企业的高层管理者。
- ◇ 主要内容为重大研讨活动、论坛、沙龙等学术交流中富有价值和启发性的综述文稿及学者文章。
- ◇ 稿件来源以马洪基金会及智库百人会的专家智者为主，同时也广泛欢迎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积极参与。

地 址：深圳市罗湖区银湖路金湖一街 CDI 大厦 4 楼 邮 编：518029

联系人：林洁漫 责任编辑：吴泽婷

电 话：0755-82470728 电 话：0755-82470650

网 址：<http://www.szmhf.com> 微信公众号：szmhf01

